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法师 主编

中国佛教忏法研究

圣凯法师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主 编
朗宇法师

副主编
圣 凯 道 坚 黄夏年

中国

佛教

忏法

研究

圣凯法师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忏法研究/圣凯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ISBN 7-80123-636-X

I. 中… II. 圣… III. 佛教 - 宗教仪式 - 研究 - 中国 IV. B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094490 号

中国佛教忏法研究

圣凯著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霍克功

版式设计：司博文 陶 静

印 刷：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375 印张 320 千字 图表 49 个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书 号：ISBN 7-80123-636-X/B·237

定 价：28.80 元



总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磨”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傍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



总序

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突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



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已经蔚为大观，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有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

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朗 宇

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总

序



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不久我应邀讲授有关印度佛教的课程，当时佛学院开了一个班，大约七十余人。这批学员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寺院，文化程度和年龄参次不齐，有四五十岁的，也有十几岁的。在我的印象中，岁数大的僧人大部分是各大丛林的住持，岁数小的则是一些丛林中的侍者。给我印象深的是，里面既有国外留学回来的高材生，也不乏曾经是国民党的高官或者“贵人”，这些人为什么会抛弃富禄甘愿到寺院生活，我没有问，但是他们都非常虔诚信佛，考试时一些学僧的答卷写得非常认真深刻，甚至还有针对我的讲义提出反驳意见者，我想没有深入的体验，他们是不会写出这种答卷的。可惜的是“文革”运动，这批僧人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逃过劫难，只有当时还是年轻人的僧人最终留了下来。这批年轻人现在也有七八十岁了，并且成为我国解放后佛教的元老或中坚，像净慧法师、传印法师、广德法师、无相法师，以及王新居士等等都是当时班里比较年轻的僧人。

“文革”以后，大地回春，中国佛教开始复兴，现在正在以迅猛的势头发展，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佛学院重新开始招生，我虽然没有再讲课，但是看到青年一代的成

序

长，并且正在成为佛教界新的栋梁，为之感到高兴，即使我没有直接给他们上课，但是我和他们的接触还是不断的。我看见威仪严整、青春焕发、见识广博、充满活力的学僧，更让我感到中国佛教将有未来的明天。

圣凯法师就是在中国佛学院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僧。我与他相识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因为他长得很高，大家称他为“高僧”（将来当然会成为高僧），所以他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圣凯法师年轻有活力，在学习上非常认真与执著，他本在佛学院读研究生已经完成学业，但是他仍不满足于佛学的追求，又到南京大学深造，学术水平不断提高。他在中国佛学院念书时就爱好写作，喜欢动脑筋思考问题，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到南京大学攻读博士以后，写作的欲望一发不可收拾，连续不断地在各种报刊媒体上发表文章，有的人只能写一种文体，圣凯法师既能写隽味无穷、感人的散文，又能写比较枯燥学术气息浓厚的学术论文，这在学术界里是不多见的。圣凯法师佛学基础扎实，又受到了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他的文章有理论，有修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近年来发表的各种研究佛教的文章，已经显示了他变得更加成熟，饶有见地，真是青胜于蓝，后生可畏。

这本关于中国佛教忏法的研究著作，是圣凯法师多年来潜心研究的成果。“念经拜忏”是每个出家人的本分，但是关于忏法的来龙去脉，以及历史演变，大陆的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不多，但是日本和我国台湾的学者早已涉足。忏法本是印度佛教实践的内容之一，但是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忏法也成为佛教中国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已并不只是印度佛教所传的忏悔的原意，而增加了不少中国佛教徒的理解，成为一种



序

有明显中国特点的佛教仪式。中国人对忏法有自己的理解，从隋唐以后忏法就一直受到了中国佛教界人士的重视与研习，到了明清以后，成熟的忏法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特色内容之一。中国佛教里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的忏法，但是天台宗对忏法则显得更加重视，经历代天台祖师的努力，先后建立了法华忏、金光明忏等四大忏法。禅宗、密宗等也有自己的忏法。圣凯法师有志于要将各宗的忏法逐一研究，并且连续不断地在撰写这方面的文章，这部忏法研究只是他已经写出的一部分成果，随着时光的推迟，我相信他会写出一部比较全面的中国忏法研究的史书。

是为序。

黄心川

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2004年6月6日

目 录

总 序	朗 宇 (1)	
序	黃心川 (6)	
中国佛教忏法研究史的回顾	(1)	
忏悔原语的含义	(11)	
一、前言	(11)	
二、各家对“忏悔”的解释	(12)	
三、有关“忏悔”的梵文	(18)	
四、律藏中“忏悔”的用法	(23)	
五、结 语	(27)	
目 录		
《梁皇忏》及其作者辨析	(29)	
一、问题的提出	(29)	
二、文献资料及研究成果分析	(30)	
三、《梁皇忏》忏法形式及思想探微	(39)	
四、《梁皇忏》与《经律异相》之比较	(59)	
五、《梁皇忏》的形成经过及作者辨析	(68)	



六、结语	(77)
天台忏法的形成及其思想	(79)
一、前言	(79)
二、天台忏法形成的历史背景	(80)
三、智者大师的忏悔思想及其原理	(89)
四、结语	(111)
《法华三昧忏仪》研究	(114)
一、前言	(114)
二、以《法华经》为中心的修行法门及其流行情况	(116)
三、《法华三昧忏仪》的组织结构及其内容	(138)
四、《法华三昧忏仪》成立的相关问题	(148)
五、结语	(159)
《圆觉经道场修证仪》新探	(161)
一、前言	(161)
二、《修证仪》的内容与结构	(164)
三、《修证仪》与《佛名经》	(193)
四、《修证仪》与天台忏法	(201)
五、《修证仪》与天台止观	(214)
六、结语	(218)
知玄与《三昧水忏》	(220)
一、引论	(220)

二、《水忏》与《修证仪》、《佛名经》.....	(223)
三、《水忏》的作者及真伪问题	(232)
四、知玄的生平事迹及其特点	(244)
五、《水忏》的忏悔思想与《梁皇忏》	(258)
六、后 论	(267)

迦才的忏悔思想	(270)
一、迦才与《净土论》	(270)
二、忏悔与末法根机论	(274)
三、忏悔与往生业因	(282)
四、结 语	(285)



唐代律宗的忏悔思想

——以道宣与道世为中心	(287)
一、前言	(287)
二、菩萨戒的忏悔思想	(290)
三、道宣律师的忏悔思想	(296)
四、道世的忏悔思想	(302)
五、后论:道宣与道世忏悔思想的不同	(305)



目

录

唐代禅宗忏法新探	(307)
一、序 论	(307)
二、唐代禅宗在忏悔思想上的不同展开	(309)
三、唐代禅宗忏法实践的形态	(318)
四、后论:中国南北文化对唐代禅宗忏法的 影响	(326)



论弥勒礼忏仪的演变与发展	(330)
一、问题的提出	(330)
二、南北朝时期有关弥勒礼忏仪的制作	(332)
三、唐、五代时期弥勒礼忏仪的制作与流行	(336)
四、明代如惺《得遇龙华修证忏仪》	(342)
五、结语	(345)
慈云遵式的忏法实践	(347)
一、慈云遵式与宋代天台宗	(347)
二、慈云遵式的忏法实践	(353)
三、结语	(364)
近现代佛教对经忏佛事的反思与批判	(365)
一、前言	(365)
二、近现代佛教经忏佛事的流行及其特征	(368)
三、经忏佛事的反思与批判	(374)
四、结语	(383)
中国佛教忏法的理念及其现代意义	(386)
一、前言	(386)
二、儒家、道教对中国佛教忏法的影响	(388)
三、中国佛教忏法的理念	(395)
四、中国佛教忏法的现代意义	(403)
后记	(407)



中国佛教忏法研究史的回顾

对于中国佛教忏法研究，虽然没有看见系统的著作，但是出现了许多论文形式的研究成果。最早对忏法引起注意的是，矢吹庆辉博士于 1927 年出版的大作《三阶教研究》，首先对三阶教的七阶礼忏的名义、经典依据等问题提出相当珍贵的论证，并且对三阶教与净土教的关系，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叙述。^①

1935 年，大谷光照提出了《唐代佛教的仪礼——特别关于法会》一文，主要是从历史文献中钩取有关各种佛教法会的资料，重新阐释唐代的恒例法会与非常例法会，并论及法会的仪式、作法，包含了行香、读经、行道、梵呗等四项。^② 事实上，其中的梵呗文和礼忏文中所见的梵呗也是一致的。

1959 年，盐入良道先生对智𫖮的忏法进行系统的研究，

① 矢吹庆辉《三阶教の研究》，岩波书店，东京，1973 年。

② 大谷光照《唐代佛教の仪礼——特に法会に就いて》，《史学杂志》第 46 卷，第 10、11 期，1935 年。



发表了《忏法的成立与智𫖮的立场》一文,他是研究中国佛教忏法的权威,发表过许多有关忏法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忏法流行的特色进行了考察,尤其指出了智𫖮对忏法的立场:忏法的行法是进入坐禅实相正观的前阶段,突出了宗教礼仪的性格,除去了以前的世俗祈愿的特点。^①

1961年,佐藤哲英《天台大师研究》是本世纪研究智者大师的力作,对智𫖮所作的忏法,如《法华三昧忏仪》、《方等三昧行法》、《请观世音忏法》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且对智𫖮的净土信仰及与有关净土教的著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使我们研究智𫖮的忏法及净土信仰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及重要的启示。^②

1963年,盐入良道先生发表了《论中国佛教礼仪忏悔的受容过程》,对忏悔在中国佛教的转变,以及忏悔的仪式化进行了通盘式的考察,为我们理解中国佛教忏法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知识。^③

同年,井口泰淳先生《论敦煌本“礼忏文”》一文,指出敦煌遗书的“礼忏文”有二十件写本是从三阶教典籍《七阶佛名》所略出,而七阶的普佛礼忏和《法华三昧忏仪》以及《国清百录》中的“敬礼法”也具有类似的形式,并且指出三阶教的礼忏文

^① 盐入良道《忏法の成立と智𫖮の立场》,《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7卷,第2号,1959年。

^② 佐藤哲英《天台大师の研究》,百花苑,京都,1979年。

^③ 盐入良道《中国佛教仪礼における忏悔の受容過程》,《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11卷,第2号,1963年。